

評論：我們為孩子找媽媽，但誰人為我們找媽媽？

(2020年4月27日於《立場新聞》發表 <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我們為孩子找媽媽-但誰人為我們找媽媽/>)

文：蔡蘇淑賢（香港保護兒童會總幹事）

最近看了兩套香港電台製作的影片，深有所感。

第一套是剛播出的《[浮城絮語：氹氹轉](#)》，故事雖簡，意義卻繁。故事的主人翁是8歲光仔，家住景觀開揚屋苑，擁有自己的房間，家中設有紅酒櫃及黑膠唱盤，是香港典型的中上家庭。父親中港兩地走，母親則任職於玩具店。儘管光仔物質生活豐富，零用錢甚至多至可以買幾套電子遊戲送同學，但在整個影片中卻愁眉苦臉。光仔邀請同學放學到其家中一起玩，朋友仔十分投入玩他家中的電子遊戲，獨光仔沒有參與其中。何解？原來光仔並不會玩。媽媽絕不吝嗇為光仔買電子遊戲，但似乎未曾與他一起玩過。即使媽媽偶然與他去吃飯，卻只顧回覆手機訊息，甚至光仔把他們的飲品互換也未察覺。有一幕光仔放學後回家，直至晚上也只孤獨一人，直至深夜父母才回。

中產孩子也有匱乏的時候

這故事訴說甚麼呢？影片暗地裡說明了一找媽媽。影片中，光仔媽媽在其店內兩度為走失的孩子尋找媽媽，但光仔何嘗不是每天都在尋找她的媽媽呢！正確點說，是尋找爸媽(片中爸爸只短暫出現一次，且完全不見臉部)。長久以來，我們的福利政策只集中扶助貧窮家庭，但家庭的需要並不單純是物質方面，更重要的是健全的家庭功能。光仔物質不缺，但正正少了家庭成員的關愛及心靈支持。這種形態也就是我過去撰文提及匱乏家庭的其中一種，其餘尚包括缺欠親職承托、社交網絡薄弱及缺少穩定照顧者等等。(見 [「長全日」幼兒學校照顧匱乏家庭](#))

孩子健康成長要支援

近年，普遍市民的收入提高了，但同時雙職家庭、單親家庭、再婚家庭及一家兩地的情況亦逐步增加，過去家長應有的功能日漸失落及逐步外判。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往往更難感受雙親的關懷、陪伴、指導與督促，影響其一生的安全感、自我價值與待人處事的態度及價值觀，因此這一代孩子較其上一代遇到更多困難。殞落的家庭功能並不能一朝便能健全，特別是不少父母都面對種種困難，但孩子的成長並不能久等。因此，除了逐步協助匱乏家庭健全其功能之外，同樣重要的是為其孩子提供即時支援，承托其成長。這便是我服務的機構為何要設立兒童及家庭服務中心的原因。

自負盈虧服務的價值

說到這裡便令我想起香港電台2019年播放的另一套影片—《[台灣故事II：小草的夢想](#)》。影片正正講述一位令家族生意起死回生的年青人(林峻丞)，看見來自家庭功能失衡孩子的支援需要，便毅然放棄年收五千萬的家族生意，創辦社區中心—小草書屋(註：其實並不賣書)，為弱勢社群的孩子打拼，免費提供課後輔導、情緒支援、職業訓練及工作機會。片中透過單親少女鳳儀失去母親後的一段故事，突顯這些支援如何在孩子生命中發揮不可磨滅的作用。不過，影片最令我動容的是有人願意放棄高薪厚職走到最前線為孩子工作，而且以自負盈虧方式營運。因為我服務機構的兒童及家庭服務中心亦以自負盈虧方式營運，明白當中的風險及辛酸。事實上小草書屋亦曾面臨嚴重虧損而必須收縮業務，而我們的兒童及家庭服務中心亦是虧損連年，所以特別有共鳴。面對同樣的處境，我們不約而同有共同的信念：「相信一定會有人看到我們(培育生命)的價值」。最終我們都用同樣的方式解決，從社區上募集資金及尋找基金會支持。

社福機構自己也找「媽媽」

說到這裡，其實這類自負盈虧的服務亦何嘗不是與光仔一樣，常常在找足以支持它繼續成長的「媽媽」？只是這「媽媽」可以是一個人、機構，甚至是一群人。

香港人樂於捐款，絕不比台灣遜色。根據英國慈善救助基金會〔Charities Aid Foundation, CAF〕2018年的報告，在樂於捐款方面，香港在144個國家/地區當中，排18位，台灣排在47位。過去，香港人為大大小小的災難捐款，有目共睹。儘管如此，我敢說要為香港的自負盈虧服務找「媽媽」絕不比台灣容易。香港人的確在慘絕人寰的災難前絕不吝嗇捐款，但自負盈虧服務往往都不是這類低成本高產出且效果立竿見影的緊急救濟性服務，反而更多是效果細水長流的持續發展/預防/補救性及結合人本的服務。

雖然我確信一定會有人看到我們(培育生命)的價值，但要等待他人無意中看見實過於被動，而自負盈虧服務限於資源，卻又往往難以主動展示服務價值。更大的問題在於香港人的社區歸屬感遠較台灣薄弱，即使居住在灣仔大佛口多年的居民，也不見得會以灣仔人自居，更遑論是大佛口人！正因如此，也就更難打動區內居民捐助效果細水長流的自負盈虧服務，共建美好社區。

說到這裡，心裡泛起一個慨嘆：「我們為孩子找媽媽，那麼誰人為我們找媽媽呢？」